

叩寻“学”、“术”的“变”“常”之“道”

——叶隽《变创与渐常》书后

刘超

笔者与叶隽先生相识未久，但在许多年前已读过叶先生的不少论著。相识之后，由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时有接触尤其是去岁深秋在京郊的一次会议期间，通过深度接谈，对叶先生的学术理念增进了解。对其学术气象也多有体察也正是在那时，初次读到了叶先生主编的新问世的“会通丛书”，其中就有叶先生的新著《变创与渐常：侨易的观念》。叶先生年轻才高，成果丰硕，久负盛名。在笔者最初的印象中，叶先生一直是以治“文史”之学、尤其是留学史、教育史及德国学见长的，今番批览此书，方惊异于其在理论方面也有如此不凡的功底和造诣。去冬今春，笔者多次研读此书，时有所感。现不揣浅陋，略表一二，抛砖引玉，以待高明。

—

应当说，在客观世界中，“侨动”现象在在皆是，在学术领域，“侨学”并不稀奇，“易学”更是源远流长，但研究因

“侨”而致“易”的“侨易”学，则颇具新意。由于本书的面世，“侨易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说体系，亦已初具架构。无论是在具体知识、论述方式还是在论断上，是书都令人耳目一新。书中许多创获和亮点可圈可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二元三维”的理论框架，即：

道（形而上）— 文化 — 尚辞述言

度（形而中）— 制度 — 尚变循动

器（形而下）— 器物 — 尚象制器

上述“二元三维”思维框架的提出，为我们理解“侨”和“易”都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因二力之交互作用，或合力、或对抗乃至悖反事物之间的“交感”力，则构成万物发展前进的基本动力。

按作者所言，“侨易”有三原则：一曰“二元三维，大道侨易”，二曰“观侨取象、察变寻异”，三为“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其精髓乃在于“易”，因“侨”而致“易”，此亦侨易学的基本理念¹。“侨”为原因和过程，而“易”则既是过程、更是结果。一般地说，“易”（变动）与“不易”（恒常）之间有某种潜在的规律，作者苦心孤诣所着力探索求的也正是这“易”与“不易”之道，寻求事物纷繁复杂、变幻万千之后隐藏的道，

¹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报，19页。

即相对恒常的规律性东西。而所谓“侨”有横向的纵向的，纵向的则是下移和上升；横向的则是地域、场域，此为空间意义上、也包括社会流动意义上的变动。

“生命在于运动”，任何社会事物的活力来自于其生生不息的运动（国家也是如此。故曰“周虽旧邦，其名维新”。冯友兰在国难危重之际的“贞元六书”，隐含“贞下起元”之意。他所找寻的也是“易”与“不易”之道）。但运动有其内在规律，这要有大本大源的东西核心的支撑，即核心思想。按钱钟书的论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不同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元素和结构。金岳霖便指出：“每一文化区都有它地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而这“崇高的概念”，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则是“道”，在印度是梵（或涅槃），在希腊是 Logos²。它们各有差异，但都是对万事万物的本原或者说人与世界关系的终极性思考。这些概念，在各自的文明系统中，都是高度抽象的、普适的，也是形而上的核心概念。

而所谓“道”，则部分地体现为“中”。东方围棋鲜明地体现着“中”的精神。也正是围棋大师吴清源的悟道精髓，融合了中日两种文化之精髓，并最终提出蜚声遐迩“中的精神”。此亦与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意暗合。本书作者能深入文

²参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256-257 页。

明形态的深层结构，既广大又极精深幽微。当然，于学者个人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历练，才能体察到世道人心的种种。

从发生学的视角追本溯源来看，本书所着力构建的“侨易学”自觉地吸收了许多文明中的养分，其中就有中华文明元典之一的《周易》。有人曾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部“天书”，一为远古时代的《周易》，一为近古时代的《红楼梦》。易经乃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它是儒道之圆融，体现着孔孟之大道，也彰显着老庄之大道，参透了天地人生的内在精义。在国人叩寻“大道”的历程中，易经始终是千年“不易”宝贵财富，启迪着无数人的不懈探索。即便后来中华文化邂逅印度文化之后，也通过交汇、碰撞，吸收了其中的养分，实现了自我更新。近代以来许多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方东美、牟宗三等，都曾关注此大本大源的问题。冯友兰曾著“贞元六书”，金岳霖则起而《论道》。张岱年则是致力于中、西、马三者的汇通合流，形成了《天人五论》；方东美亦追寻生命万物之道、之本源。

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早在“轴心时代”已基本成型，此后经过长期发展而日臻完善。之所以成型于那个时代，得益于那个时代特殊的时代环境，而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活跃、元气淋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因为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也就因为“动”的因素。

按李济的说法：“中国人远远不是在四千、三千或两千年里一成不变的。哪怕在一千甚至五百年里也不是的。在其扩展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征服、被征服和再征服，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并重塑其文化，所到之处，他们都吸收了新的血液。”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游牧民族统治者当国后，“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³碰撞出火花，运动增活力。中国文化正是在“易”动之中保持了活力，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和持久的辉煌。正如蒋梦麟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维系不坠”。中国“也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翁文灏则说，中国历史上就有“同化他民族或他文化的力量，常常在那儿活着，把各种不同民族或文化都慢慢的调和了，溶解了。”中华文化维系千年而不坠，是因其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的相对独立性和包容性（当然，还有中国在地理上的宽广性和稳定性），成就了其超强的延续性和丰富性。

³汪晖、施密特《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南风窗》2014年6期，2014年3月13日。

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就形成了中坚理念或曰核心思想，支撑它的整个发展，使整个文化有强健的生命力，故历千年之沧桑而生生不息，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连续性。这种不断的“自我更生”（reinvention），才成就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使中国文化才经历过数百年低谷之后又有今日的蜕变、再起和复兴。

这或许不无某种历史的偶然，但偶然之中也必定有某种必然，与中华文明极高的智慧分不开。昔日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美国的庞德、拉美的博尔赫斯，都对中华文化有着特别的推许，而今日德国资深政治家施密特也不无感叹地说：“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了。3000 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 4000 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⁴

在宽广的中央大陆上，中华文化曾与印度文化比肩而立，成为中坚文化区的“轴心”。然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并

⁴ 参 2013 年 1 月汪晖与施密特的对话，汪晖、施密特《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南风窗》2014 年 6 期，2014 年 3 月 13 日。应当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普世价值的认可，并非孤立的现象。如在 1988 年，由 75 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发表的巴黎宣言就说：“人类如果要在 21 世纪生存，就必须到 2500 年前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以此为基轴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因此，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亚洲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作者在书中指出：“要想成为一个能在悠久的文明史中把握‘易道中庸’原则的中坚性的文化民族”，除了“文化侨易过程”之外，必须至少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即“中坚思想性与崇高理念”，“大度包容性和吸收能力”，“自我独立性与天下胸怀”。“成就一个文化区的中坚思想民族……必须形成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有足够的区域感召力，有强势的文化聚合力。”而要实现这点，需要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还需要获得“交感”，即“对异质文化的敏锐感知力、大度包容力、强势融化力、原发创生力。”这里所关涉的，是文化根基的问题，是大本大源的文化的核心问题。而作者此书的论说，表明其对文化的深层结构有深入的把握。显然，学术至此已无疑地表明作者所着力追求的显然已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而是有情怀、“有思想的学问”，其意乃在“追寻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⁵。这种学术取向决定了作者已非普通的考证型学者，而已成其为思想型学者，后者往往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善于体察、把握并破解第一流的课题。

二

⁵ 《何谓学者》，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13 页。转引自叶隽《变创与渐常》，94 页。

人类文明系统中，文化处于核心层面，在位势上居于高端；但它同时也能“下延”，衍生为制度、甚至外化为器物⁶。正是在这种纵向的互动和转化中，文化、制度与物质（包括资本）便始终深度咬合在一起，难分难舍，界限亦往往因之淡化。

人是社会性动物。文化性和政治性是人类固有的属性。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有人的地方，也就有政治。政治是客观存在的、无所不在的。处于观念层次的学统、道统与操作层面的政统（包括政治的制度和体制）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地，“政”与“学”之关系也值得关注。学术不应依附于政治，但学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绝缘于政治。二者之间或有顺逆、有依违离合，但不可能全然分开，两不相涉说到底，政治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学术在本质上所关注的也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前者反映的是这种关系的现实状态，而后者则追求其理想状态。政治的原初意义是要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文化有现实的功用，但也有着终极的关怀。修齐治平，经邦济世，乃士之所念，“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也。古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严复更自诩“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此话虽不无狂气，但亦非毫无道理。“知识就是力量”，

⁶ 叶隼《变创与渐常》，242页。关于学术文化的“器物性”功用，可参该书167页。

作为经过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思想的力量更是不可小觑，其渗透力、辐射力甚至穿透力有时甚或至足惊人。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他的想法是对还是不对，比一般所认为的作用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们，很少是别人。事业家自以为可以完全智力上的影响，而实际却往往是某一已亡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类固有的“求道”之心或“求知欲”⁷，但真正先“知”先觉、“近道”得“道”的，注定是极少数优秀者。而这一部分优异者，正是通过人类对“道”的本能的渴望和遵从实现了对他人的征服，对社会的渗透力、引导性。

文化与制度、与物质有着密切关系。特定的文化环境（或土壤），会孕育出特定的政治制度、政体结构、施政风格和政治人物，也会有相应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和水平。正如丹纳所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今葛兆光教授亦称：“文化的传播同样需要一定的‘水土气候’”，这主要牵涉到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每一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犹如人体对食物养分的吸收一样，都有一个分辨、选择、淘汰、排斥消化的过程，对于具有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⁷ 可参叶隽《变创与渐常》，167页。

的汉民族来说，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尤为突出。”⁸历史地看，“大国崛起”往往与文明的崛起有关。文明的兴衰与中坚文明区的兴衰密切相关。文化是政治（制度及实践的）的开路先锋、铺路石，也是其润滑剂。

英人撒切尔夫人曾云：“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近人雷海宗在上世纪前半期曾说：不读中国古代史，就不知道中国古人是多么伟大；不读世界近代史，就不知道的今日中国是多么落后。无论古代中国曾有过怎样煊赫的文明，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变革浪潮中，中国业已落后。文化上的贫瘠曾长期地困扰了数百年来中国。我们对不起这个曾备极辉煌的文化传统，故今人亟需奋起直追，努力实现文化的复兴。而在此过程中，借鉴域外资源也就成为吾人跨越式发展的不二法门。无疑地，这需要一批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接续努力。

作者对文明系统内在的深层结构的探索，和对“民族文化单元”元思维的追索⁹，隐然彰显着对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民族文化的努力。现今中国在重构亚洲文明中坚区的努力，仍任重而道远。而这，首先地就需要有一大批具有

⁸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1页。

⁹ 按照作者的理解，作为亚洲中坚文化区的中国和核心文化元思维乃是“易道中庸”，209页，及197页。笔者认同这一判断。但对其他文化区（如北美文化、澳洲文化）核心元思维的考量，叶隽君尚有难解之处。其实，主要是区域划分方面需重新斟酌，尤其是要突破文化意义上、特别是现代行政区划“洲际”的划分。

高度原创性、消化力乃至同化的“为文化所化之人”，并且，需要相当的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侨易学”的提出本身就是对文明系统内部的“易”与“不易”之道的独立探索。自然地，本书的作者蕴含着（但不是附带着）有更大的关怀、更深的用意。这种关怀和用意到底是什么，答案就部分地潜藏于在本书之中。

三

任何思想、理论或学说，都只是为理解世界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使人类认识更为理性化系统更结构化），而不是全部。人类追求真理的全部努力，其目的和效果，都不是终结真理，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真理开辟新的道路。“侨易学”亦然。因“侨”而“异”，这不难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致“易”的因素是非常多样的，除空间的侨动之外，还有时间的问题。时光可以改变许多东西。在没有明显的空间侨动的条件下，时间本身同样可能“致异”。人心是非常幽深、非常复杂的，每个人的内心都自成一个独特的小世界。要之，“变异”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空间的变化，还可能是时间的流逝，也可能是心绪、意志的作用。一念之间的观念和行动，可能会有引生出诸差异（“易”），孕育出很多五彩缤纷的物事。既然存在“因地而易”，也就存在“因时而易”和

“因人而易（异）”。此中种种，是极为微妙的、甚至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是难以把握其规律的。在此，除了科学更多的是艺术的、心理的，甚至是超出人类知力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即有人所谓之“天意”）。在研究这个方面，则需要极尽幽微之能事。即是说，“易”可能不止因空间之“侨”，也可能是时间之“动”，或者人心人情之变之异。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宏观的和微观的因素，我们都不能有所偏废。

换言之，在探究“侨”“易”问题时，作者在实际研究中较多地偏于对明显空间位置的“动”，对事物自身内部的“动”体察似仍显不足。事实上，任何事物——包括知识、场域、制度、物质、资本等——的变易，除了在空间的侨动之外，也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它同样也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这种相生相克的阴阳两面（即对立统一的矛盾着的两面），是事物本身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源泉。对事物内在理路（或微观结构）方面的之“动”所致之“易”，同样值得深入探究。不过相对来说，在本书中体现得尚不充分。在第七章中，作者对“侨易”的个案研究中，试图以新的理论范式重构某些历史，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惟因理论初具，个别的阐释尚未臻圆熟，也是正常的。

任何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研究对象（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世界、或者说人类的一切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简化处理”或条理化的分解，然而，问题在于，这

个“世界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就是再简单的物体也是由亿万个原子组成的”。¹⁰一个小小的人脑的精神元数，就远远超过复杂万端的庞然大物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的零部件的总数。这种生理结构的高度复杂性和各自阅历的独特性丰富性，决定了每个人的复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可替代不可复制性。人的思想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其生成机制也难以“一言以蔽之”。其内在结构并非线性的，它不是板块结构，也未必是网状结构，而往往接近苍天古木的根须状结构，它本身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能够不断生长（制度体系虽不全然如此但也不无相类之处）。思想宛若擎天巨榕，其外形显露于地表，而其更重要的实体则隐匿于地下，而且比地面的枝干更长，更曲折、更盘根错节。大树之所以能如此枝繁叶茂、气象万千，正是其地下的根须异常发达，其隐藏的内部深层结构更繁覆更丰盈。——当然，以笔者个人偏好而言，更倾向于把它视如参类，其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几乎都隐藏在地底，而且更长更丰硕更曲折缠绕。在学术领域，往往是那些潜藏得越深的问题，开掘起来越艰难，但也越富魅力、越有价值。对此，若研究者经受过更好的思想史训练，或有足够的思想史视野，将有更深的把握。——可以相信，随着作者个案研究的进一步丰富、理论思

¹⁰ [德]施特凡-格雷席克《混沌及其秩序：走近复杂体系》，胡凯译，百家出版社2000年版，7页，转引自叶隼《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169-170页。

考的继续推进，其研究将循事物的“内在理路”更大幅度地纵深推进，“侨易学”理论体系料必将在许多方面均有显著拓展，并更显丰富缜密。

作者治外国文学出身，又在学术史方面耕耘有年，在“文”、“史”两面均有丰硕建树。更因其多年淫浸于德国学术中，不意间习得了德国学术之精髓，能够对德国的思辨性有自己的心得和造诣，故其下笔行文，时有哲思之华彩。哲学是文化中最高端（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作为位居顶端的一种精神文化，它统摄整个精神文化，进而浸润形而中的制度文化和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对哲学的领悟，提升了作者学思的高度和思维力度。

作者有着多方面的才具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其知识和才能非常全面，从古代儒学到近代“侨学”到今日德国学，从欧西哲学到印度宗教，从数学史到易学，均有心得，这种中西古今文理打通的学术功底和文化视野，为其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作者由此而潜心致力于构建东西学术之无梁殿，“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种宏丰博大的学术气象，在新一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从作者的学术生涯来看，这也是对作者此前学术态势的一次继承和突破。本书也是作者学术才情的一次综合展现。这虽是一部“理论”著作，但除了有理论著作应有的思辨性（即理论色彩）之外，还有着很强的实证创获和审美内涵

尤其是在第七章中，作者的多年治史的功力得到展布。通观全书，有史家的实证能力，有文学家的审美的体察力和创造力，也有哲学专业人士的思辨性。于普通学者而言，能在以上任何一方面有自己的特色，都值得恭喜；但本书作者已不止是“文史不分家”，而是“文史哲兼胜”，于史学、文学和哲学均有相当功力。一人而兼三美，至为难得。此等修为，在方今学界是不多见的，足为新生代学人之佼佼者。

“侨易”学的系统化，不仅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而且开拓了新的学术视域和观察维度，由此有可能打开一种新的世界图景。由此，留学史、移民史/侨民史的研究获得新的意义，器物、资本、制度、知识、思想等层面的侨动也呈现出新的学术意涵。

本书文字畅达明快，这是学术著作中非常难得的。“深入浅出”之语，看似套话，但细究起来，实乃知易行难，实行起来殊为不易。须有大学问，才能“深入”；有好文才，方可“浅出”。这是许多（不客气地说，是大多数）学院派人士“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然而作者做到了。本书从形式到质地，均属上乘。这是作者之进展，也是学界之硕果。这是作者首部“纯粹理论性”的专著，但因沉淀有年，打磨多时，故颇为厚重富有新意。它意味着作者的学术格局、学术眼界有新的进展，也预示着作者新的学术转型和日后更

其广泛的学术前景。

作者师出名门而自成一派，富有学思锐气。本书创见迭出，亮点时现。其具体论断“或有时而可商”，但这种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这种治学的门径和气象，是令人欣羡和值得期待的。

2014-3-19 上午初步草成

2014-3-25 夜晚基本改定于清华园寓所

2014-3-28 上午再改